

#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13位ISBN编号：9789888208197

10位ISBN编号：9888208195

出版时间：2013-10

出版社：香港大學出版社

作者：曹南來

页数：2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 內容概要

與以往學界對中國基督教活躍於內陸鄉村社會的認識有所不同，本書側重描繪基督教在發達的沿海商業中心溫州迅猛崛起的軌跡，並以溫州為例，剖析宗教實踐、宗教空間和宗教話語在中國城市現代性變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內容涉及政教關係、民營資本主義發展、日常消費、性別關係、道德文化、階層關係、城鄉差異以及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作者為寫作本書所做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和生活史素材的收集歷時近兩年，勾勒出一幅新興城市商業精英所引領的宗教復興之圖景。通過著重記錄商人基督徒群體在日常框架下對現代性與經濟發展的理解以及他們的身份建構，力圖從社會文化層面揭秘改革時期都市基督教的驚人增長。本書強調基督教並非一個內部高度同質的意義體系，而可將其當作一面棱鏡，多角度透視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宏觀過程。本書可用作中國人類學／社會學、都市研究、宗教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的大學教材。

「對於對政教關係或對現代中國宗教實踐有興趣的人士來說，這是一本必讀書，作者淺白易懂的文字適合用於本科教材。」 《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這是第一部關於中國基督新教的民族志專著。曹南來博士成功地粉碎基督教在中國作為洋教的刻板認識，讓讀者窺見一個已高度本地化、去政治化的宗教，而這一宗教又與資本主義經濟行為形成高度互滲。」 《亞洲人類學》(Asian Anthropology)

#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 作者簡介

曹南來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兼任宗教高等研究院研究員，研究課題涉及宗教與移民、跨國商人社區，以及中國的全球化。

#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 精彩短评

- 1、态度第一，案例第二，观点第三！
- 2、曹的老板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还是韦伯意义的呢？如果因为整个社会有逐利的倾向，那么我们怎么能认为老板基督徒仍然是伦理精神的作用呢。想起李向平指导过一个研究老板佛教徒的博论，佛教显然不同于新教的理性伦理，老板佛教徒的意义如果不从伦理上找，又该怎么解释。
- 3、何以证明基督教是信徒眼中“西方都市现代性”的代名词？基督教似不再是宗教，而是一袭华丽的身份外衣。
- 4、冲着所谓的“历史地域的建构”（作者导论语）和“在巴黎的温州人教堂”（没记错的话，黄建波的书评里特别指出）去的，但是书中对两点似乎都没有讲清楚。。。好几个人都说，关于温州人在外地建立自己的教堂的研究蛮多的。。。为嘛我就找不到（本书中提及的王春光的《温州人在巴黎》也只是关注移民方式、生存方式和社会融入问题，根本不涉及建立教会！好吗）？？是我检索的方式不对？？？求万能的豆瓣友邻推荐、指导！！！
- 5、导师的书要认真看啊。
- 6、内容大致可信可惜两个致命问题：一太理想化二理论水平太差。集中体现在，混乱使用“现代公民城市”等感情偏向明显但又歧异溢出的词汇。英文版好点。
- 7、作为一个非温州人，田野做得不错，讨论也还可以，配得上一本获奖作品。
- 8、不是让我振奋的信息。
- 9、之前看了作者的一篇论文，简直说醍醐灌顶也不为过吧。就这本书来说，光写法也是可以给五星了。

1、评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作者：吴科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原载《亚洲人类学刊》（Asian Anthropology）译者：何松蔚曹南来的《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一书是第一本有关中国基督新教的民族志专著。它对温州的“基督教热潮”（Christian effervescence）（第2页）有着详尽、引人入胜的叙述，在我看来，其最重大的成就，在于它成功地与“统治-反抗”范式分道扬镳。用作者的话说，那种范式“对当地文化、历史背景和信徒主体性的作用几乎未加理睬”（第8页）。此前对中国基督徒的叙述，关注的信徒集中在相对弱势的农民、女性、穷人及长者群体，曹南来的研究则聚焦城市企业家阶层，即所谓的“老板基督徒”，并论证“温州基督教是一种历史复杂的区域建构，其框架由一个现代性的道德话语提供”（第12页）。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温州，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制造出各种新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角色，这种现代话语为这一新秩序提供了合法性。本书有效粉碎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洋教”面孔，将其高度本地化、去政治化、同时还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高度互渗的现状揭示给读者。第二章“‘老板基督徒’的兴起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描述了“老板基督徒”如何在教会事务和传教事业中运用他们的现代管理技巧。作者敏锐地指出，新一代基督徒不再采纳老一辈作为殉道者的身份认同，为了追求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他们选择与国家政权交手，并因此重塑政教关系。对于早前学者呈现出的明晰图景，这一章重新审视了其中隐藏的复杂性；宗教-国家的二分法一直主导学界，本章则开启了新视角。然而，同样的模式是否对中国其他地区有效，仍需存疑。第三章“有关礼仪、道德和现代性”用温州基督徒的日常实践将读者吸引到他们建构国际性身份的努力上——他们改变自己老土的举止，借用西方现代基督教形象。尽管基督教在国家话语中常与西方帝国主义相连，温州的基督徒却称它为“道理”，称信仰基督教为“信道理”（第52页），这进一步明确地将信仰和财富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这种事实上的联结几乎可以在全中国的城市基督徒中找到。它给予基督徒一种道德优越感，使他们能将自己区分于非信徒。然而有趣的是，“老板基督徒”用信仰管理工人，这同共产党过去管理国有工厂的方式异常相似。此外，读者或许希望了解更多关于非信徒如何看待他们老板的宗教感和道德感方面的信息，如果作者能对此多加着墨，则更加为本书增色。第四章“基督教复兴的‘温州模式’及其中的宗教商业”，考察了“老板基督徒”怎样用商业模式颇具侵略性地在中国和世界发展、投资和修建庞大的教会。温州的“老板基督徒”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看作关联他们宗教和商业双重身份的“操作指南”（第75页）。作者还指出，对于乡村企业家来说，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变为文化和象征资本十分重要。这个过程产生出一个新的地方精英阶层。作者强调，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语境下理解基督教在温州的复兴。第五、六章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章节。它们着眼社会边缘群体，并说明妇女、农民工如何服务于男性精英“老板基督徒”对道德优越性和社会声望的诉求。第五章“性别化的能动性、性别等级以及宗教身份的塑造”，描画了教会如何增强和培植性别等级——男性精英企业家与女性非精英“马大”群体的对立。男性被看作理性的，并被上帝赐予了物质上的成功；女性则被认为是感性的，通常追求身体感觉、梦想和幻觉。女性似乎同样能通过某些方式建立起权威，如保持贞洁，生男孩，或成为“祷告婆”——为城市安全祈福的灵性群体领袖，但是，此种权威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女性更多地被情感而非理智控制，而这种观念将深化中国原有的父权制。因而在温州的语境下，“性别等级在福音派基督教领域被仪式化、被称颂和自然化”（第125页）。在这个例子中，基督教等级制和儒家等级制十分强烈地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加强。第六章“皈依都市公民身份：民工对温州基督教的参与”描述了温州民工基督徒的经历。带着功利心和对跻身都市化、现代化的一等公民之列的渴求，不少民工信仰了基督教。然而，社会流动之梦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当民工基督徒发觉这一点时，他们往往选择退出。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从教会团体中获得了归属感、自主感和情感支撑，但在精英基督徒大力向民工传福音以获得“象征资本和社会声望”的过程中，他们也被塑造成温驯、高产的躯体。本书的结论强调，基督教不能被看作一个“内部融贯一致的象征体系”（第171页）。利用其基督徒的身份和实践，温州“老板基督徒”在与国家、市场和其它团体的活跃互动中，创造性地刻画出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化形象。我在教学中使用了这部民族志，它引发了课堂上的激烈讨论。学生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基督教是温州的主流宗教吗？”在其它学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温州的其它宗教，如佛、道、儒和民间宗教，若谈不上更加兴盛，也可以说和基督教一样活跃。因此，如果作者在开篇能够对温州宗教进行一个全局性的描述，并将温州基督教置于该背景下考量，则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丰富的图像。话虽如此，曹南来的作品用心而明晰，如果



##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有任何人对当代中国宗教、中国研究或更广义上的基督教人类学研究感兴趣，我都强烈推荐他阅读这本书。

2、书中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例子，简单易懂，读完后对中国的现代变迁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反思，特别是关于温州的基督教会的权力运作和发展，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对于想了解中国现今都市发展的人来说，是一本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书。

3、前些日子我在温州的火车南站候车，看到在候车室的检票口上方有一巨幅广告。这是一幅有关房地产项目的广告（项目是文成某置业公司的），上面写着：神力·迦南美地国际养生度假区（International Health Resort of Canaan Villa）；应许之地，颐养一生。候车室里或许有很多人不会注意到它的名称跟圣经有什么关系（置业公司放这个广告时的心态应该也挺复杂），但对于我来说，这大体上应该就是所谓“老板基督徒（们）”的公司放的广告。其实对很多温州人来说，像这样的广告非常普通，温州有不少企业常常会拿圣经词汇注册自己的公司名称。但它还是让我有了某种exotic的感觉，毕竟在那几天我在好几个教会来回赶圣诞晚会期间，“老板基督徒”的形象从未这么“突出”地出现在我的观察和感知范围里，虽然那几个教会中有很多人做生意，有些人还是教会的领袖。换句话说，这种exotic的感觉来自于广告中的符号所表达出来的经济地位与信徒身份的结合；这种可以说“单纯的结合”，以“类型”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让我觉得很特别。曹南来的博士论文讨论的就是这群人，虽然我也接触过，但我从来没对这群人有过像他那样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接触的生意人基督徒还不同）。看着这幅广告，确实很容易能够联想起曹的论文里所描写的这群人的形象：有经济地位，有某种所谓对现代性物质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品味”（至少是他们自己觉得）；他们跟政府、跟客户打交道时会表现出来各种来自商人身份和信徒身份所产生的张力；他们会为教会设计出程序化的管理方式，举办华丽的圣诞晚宴，会到外地外省传福音，所到之处无不建立以温州人为主的教会，会购置商品房投资建堂；他们爱好神学，会邀请各种神学老师来教会开培训课和演讲；他们会给员工传福音，要求他们也像自己一样将经济活动与信仰结合起来；而且，他们与教会中的女性与企业里的民工之间也会有各种基于现代性道德话语的支配关系。这可能就是这群人的日常生活，依照曹的叙事。但是这篇论文之所以被许多英语世界的评论者（Richard Madsen, Marie-Eve Reny, Jeff Kyong-McClain, Chloe Starr, Kurt Selles, Brent Whitefield, Mayfair Yang，中文世界见黄剑波的评论）看成是理解当前中国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份文献，是因为它展现了中国基督教很不同的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教关系并不如他们原来想的那样是如此对立的，这些老板基督徒的经济实践，正好与政府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合拍，给他们二者之间的“合作”带来了可能性，以致于打开了家庭教会（注意在曹的论文以及几位评论人的叙事中，是家庭教会）的生存空间，换言之，家庭教会不是“非法”，而是“法外”，这也是曹自己最主要的看法。其二是，曹所展现的温州老板基督徒对物质现代性的追求，给英文世界带去了不同的讯息说，原来中国基督教也可以这么高大上。除此之外，曹对女性和民工的讨论也算是比较新颖。加上这篇论文本身逻辑上的清晰、写作上的简洁，也被各位看成是本科生必看之教材。而且据说这篇论文出版后，也成为了不少政府官员的必读书。但是评论者不是没有看到曹这份论文的问题所在，特别是它对老板基督徒的讨论，几乎忽视了温州基督教内部的复杂性。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曹所描写的老板基督徒的种种，但他们无法代表温州基督教，特别是当曹的论文中不断将这二者等同时（很多时候是非常模糊的等同），它会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好像温州不是农村，好像温州基督教确实很特殊，因为有老板基督徒，于是展现了温州的“地方性”；但不少评论人又说到，温州基督教又不是这么特殊的，因为其中很多实践和权力关系（不一定是经济实践）在不同的城市教会中都会出现。我想再深入讨论它存在的问题：首先，曹或许太想要破除所谓政教关系对立的二元论，于是从一开始就将这种老板基督徒放在家庭教会的框架里，让读者看到家庭教会与政府之间其实可以有这种那种不同的关系。这自然也是西方学界最想看到的，因为他们对中国基督教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官方教会跟地下教会的对立（其来源于文革中后期乃至文革之后，海外基督教界与学界对家庭教会所谓“走过死阴的幽谷”之类的自我表述、以及家庭教会蓬勃发展的一种印象，参见梁家麟的《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不同诠释》，页151至页155）。但是实际上，老板基督徒不只是在家庭教会里，也在三自教会里（温州的三自系统也比较复杂，有纯粹由三自进行统一“服务”的三自教会系统；也有牧区权力很大而使两会成为虚置的系统——它们虽然是登记了的，但几乎不会说自己是三自教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还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去概括它们，有些学者称它们为“不三不四”的教会）。温州有太多人做生意开公司，基督徒做生意开公司也很自然，因此不同的老板基督徒跟政府的关系也会不同。曹的case或许只能体现政教关系的其中一种可能，而且没有将地方政府的逻辑展现出来，以致于Marie-Eve Reny

##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会说这篇论文缺乏一个理论框架——Marie-Eve Reny自己提出了一个政治上的containment概念来解释政府行动者的逻辑；当然我觉得理论框架什么的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教会的外在权力是不得不细致考究的（在这里，可以看一看朱宇晶讨论温州基督教的博士论文，她的论文不仅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温州基督教的内在复杂性呈现出来，并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权力场里讨论其agency[虽然agency极其有限]，她的资料很多很细致，而且我认为她真的将日常生活展现出来了，虽然其行文不够清晰，语病不少，读起来有些累）。其次，曹虽然破除了一种二元论，但是他却在行文中“创造”出另外一种二元论——城乡差别。细致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当曹常常模糊地将老板基督徒的基督教等同于温州基督教的时候，他就会容易将温州基督教当成是“城市的”，而其他“中国”农村基督教当成是“农村的”——注意，他很多时候用的是“中国农村基督徒”。不过曹自己也早就注意到温州内部的城乡差异，他有说到这些老板基督徒将经济与信仰结合起来，遭到不少老一辈信徒的反对。可是老一辈信徒的声音到底是在哪个具体的位点上发出来的呢？在三自教会中么？是在家庭教会中么？是在城市里？他们真的都是在农村里么？于是，他一来没有更多将这种内在的对立探讨下去，而且，或许是出于他对现代性道德话语的热衷，不断将温州基督教与某种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实际上，温州这座城市跟很多地方一样，已经很难说哪里是农村，哪里是城市，即便是在鹿城人眼中的乡下，也有不少老板基督徒，也有改革宗神学的爱好者和倡导者，他们与其他人（保守的老人、情感丰富的女性、持不同神学观点的男人们等等）甚至是在一个教会里，彼此的权力关系非常复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所谓现代性的追求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止是基督徒才有的，很多人说温州人是暴发户，有土豪的品味，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的（虽然我觉得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正确，但是基于关系网的礼以及人情之债的泡沫倒是越来越大）。于是：这种城乡二元论可能会消解掉曹特别想从实践的角度进行阐释的努力，其笔下的日常生活反而可能失去了日常生活的活力，基督徒主体亦被过分类型化（虽然这也可以是一种分析的手法）。再次，我们暂且不说曹的论文是否真的缺乏“地方性”（上文有提到“温州基督教又不是这么特殊”，我有一位朋友也指出，她并没有在曹的文本里看到太多的“地方性”，事实上，只要一个基督徒有钱了而且有传福音的热情，无论这位基督徒是哪里人，都或许会有曹的老板基督徒的某些特质），就从曹自己在导论里非常强调的温州基督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地域的建构”而言（P.7, P.10），我确实没有看到太多“历史”的东西。从看文本一开始，我就注意到曹的这个意图，特别想知道这种老板基督徒的现象是如何历史性地被构建出来的（这会破除掉上文曹所提出来的城乡二元narrative）。看完全书我才发现，原来，“历史”最终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是全文展开的一个模糊的context；而构建，正如书名显示的那样，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老板基督徒作为主体在构建。当然，或许这篇论文还并没有深入更复杂的温州基督徒的生活世界（可能这正是因为曹只是半个温州人导致了他没有更深地挖掘出老板基督徒所嵌入的那个“社会”），但是我相信曹的田野是非常认真的，他笔下的老板基督徒（至少是他看到的经历到的）可能确实也是如他所说那样展开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像我在候车室里看到的广告那样，很容易便联想到曹所描绘的这些人的形象。而且，无论他是否过于陷入了某种“类型”之中去，这种分类大体上也具有解释效力，至少整个文本是清晰易读的。在这里我觉得曹的文本也可以破除一些人对基督教与商业伦理之关系的迷思。其实曹的这项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告诉读者：老板基督徒是一群极具自律的人，他们可以作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楷模。曹甚至有提到，其中一些基督徒也会因为商业目的而放弃自己的道德底线（不过大多数老板基督徒都会有某种来自基督教的伦理规范，他们在“犯罪”时会有内心紧张感，这跟不是老板的基督徒没有什么不同）。我的意见是，不要宣扬什么（特别像商人基督徒会具有社会功能之类的）即便是严于律己从事实出发的讨论，也不要因为讨论的结果是那么“明确”而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很多时候，当结论如此明确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最该警惕的时候。像这样的结论甚至会成为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最终会为其带上政治性。至少在这一点上，曹的文本是值得推荐的。不过不断提醒自己日常生活是复杂的，这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学术底线吧。



## 章节试读

### 1、《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笔记-第23页

三年前，劉和另外幾個捐助人花了800萬元，在一棟辦公樓裏買下了現在這個1500平方米的教會場地。溫州市政大樓距此僅僅幾個街區之遙。劉原本是想在當地宗教事務局為自己的教會登記的，但是宗教局的官員拒絕了他的申請，他們似乎並不情願讓他的教會獲得正式的合法身份。這種新型的城市教會，是介乎於官方登記教會和傳統意義上“未經許可的”家庭教會之間的第三條路，即作為政府默認而未登記的“家庭教會”。儘管他的教會沒有拿到體現國家宗教管理的“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但是劉運用他通過商業與當地政府建立的平穩關係，獲得了相關部門的非正式承認。“那些官員喜歡和老闆維持良好的關係”，他自信地說。事實上，當地宗教事務局領導的一位親戚，是劉的工廠的商業合作夥伴。中國現在普遍的情況是，地方上的一些黨員幹部羨慕新富裕起來的人的經濟實力，他們想要聯合新富裕的人來謀取自身物質利益。劉對他的教會的現狀很滿意，因為政府已經允許他們可以公開地舉行宗教活動。此外，教會的非登記身份得到很多年長信徒的支持。這些信徒仍留存著極左時期受國家迫害的痛苦記憶，因此他們強烈反對國家以任何形式介入教會事務。p.23-24

### 2、《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笔记-第145页

我已反駁了一種國家管制-教會反抗的二分觀念，這種觀念沒有捕捉奧宗教生活的社會複雜性。改革時期的溫州教會，不僅僅是上演人們支持或反對國家意識形態的地方。各種各樣的話語都在起作用，各種各樣的主體立場被捲入當地的基督教復興中。我已經展示了基督教與階層的立場、傾向、性別分化、地域區隔及與當地社會中的日常生活經歷密不可分。教會為當地來自各種背景的人群提供了一個場所，他們能在其中形成新的社會經歷和文化認同。p.145

最後，溫州的故事為有關人權和宗教自由的爭論帶來轉捩點。它顯示出在後毛澤東時代地方分權化與市場化背景下，宗教自由是在不斷增長的，而對基督教的迫害則越來越少見。更重要的是，這項研究通過強調一種研究宗教自由的主觀取徑，為宗教迫害提供了獨特的思考視角（相對於佔主流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取向）。本研究通過當地信徒的眼睛來看宗教自由。如“反抗和受逼迫的基督徒”之類簡單化約的標籤，對當地基督徒的主體性是不公平和不恰當的處理方式是，這些基督徒渴望把自己塑造成擁有社會重要性的宗教代理人。很多溫州教會的領袖渴望把他們的宗教實踐和機構，描繪為不受國家控制與介入的（儘管他們的教會或教會機構可能沒有完全獨立於官方的監督，或者他們不得不進行一定的妥協）。這個事實經常引人注目地表現在他們宏大的教堂建築和聖誕節慶祝中，表明了這種主觀取向的重要。至於企業家身份的教會領袖是否在敘述他們與國家之間實際的接觸與關係，似乎無關緊要。他們在宗教領域對受害者化和客體化的反抗，證明了他們對能動的、榮耀的自我意識的追求。通過把溫州這座城市建設為中國的耶路撒冷，這些在社會上、空間上流動的中國人證明了兩點：他們是如何究心於在後毛澤東時期快速的城市化中，構建一種地域感；以及他們有怎樣的能力為世界基督教作出貢獻，不是以上帝的殉道者身份，而是作為足智多謀的協商代理人。全書完。p.153

p.153

### 3、《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笔记-第69页

據當地一位傳道人說，自1979年允許教堂重新開放後，為滿足當地教會聚會的需求，溫州出現了首波建設教堂的浪潮。1990年以來，在當地基督徒團體間出現了競爭現象，他們爭相“建設花費最多的教堂、最漂亮的教堂、甚至是最高的十字架”。在溫州工業化程度最高、最富有的樂清縣，大多數未登記的家庭教會都已經建造了教堂。市中心的家庭教會全都購買了教產，有些花費了五、六百萬人民幣，有些用一千多萬元購買他們的聚會場所。這種行為表面上違反了中央關於宗教場所的法規。

### 4、《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笔记-第78页

自從西方傳教士撤離溫州，一個以牧區進行行政劃分的模式已經取代了溫州教會的傳統宗派結構



##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每個牧區負責向不同的教會和聚會點派遣講道者來組織事工。這種講道者派遣系統被稱作“派工”或“派單”。這種系統實際上是牧養工作的外包，因為這樣教會就不需要它們自己的講道者。……...在這個系統中，幾乎所有的講道者都是義工，白天都有別的工作。根據一位溫州講道者1997年在中國新教的官方雜誌《天風》發表的報導，溫州只有大約100名全職牧養同工和34名被按立的牧師，牧師與信徒之間的比例是1:20000。這導致牧師的日常工作極大地依靠總數約為3500人的佈道義工。

#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